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竹木牙角器全集

4

牙角器



中國竹木牙角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竹木牙角器全集

4

牙角器

《中國竹木牙角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 任

王世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

特邀編委

鄭欣淼（故宮博物院院長）

袁南征（國家文物局研究員）

陳燮君（上海博物館館長 研究員）

謝 飛（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長 研究員）

徐湖平（原南京博物院院長 研究員）

王紅星（湖北省博物館館長 研究員）

李 剛（浙江省博物館館長 研究員）

蕭洽龍（廣東省博物館館長 研究員）

編

委

楊伯達（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田家青（中國古典家具研究會研究員）

蘇士澍（文物出版社社長 編審）

張 榮（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劉 靜（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

胡德生（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段書安（文物出版社編審）

李 紅（文物出版社編審）



凡例

一 《中國竹木牙角器全集》共五卷，主要按材料質地和時代順序編排，其中竹刻器一卷，木雕器二卷，牙角器（含骨器）一卷，家具一卷，力求全面展示中國竹木牙角工藝及家具的發展面貌。

二 《中國竹木牙角器全集》編選以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主，酌收各地有代表性的珍品；既要考慮器物本身的藝術價值，又要兼顧不同地區和流派。

三 本書為《中國竹木牙角器全集》第四卷，選錄新石器時代至清代象牙犀角雕刻精品。

四 本書主要內容分三部分：一為專論，二為圖版，三為圖版說明。



中國古代象牙犀角雕刻簡述

楊伯達

以犀牛角和象牙為原料雕鑲加工而成的工藝品，依其社會功能大致可分為實用性、珍寶性、美術性以及供奉性四大類。實用性主要是指工具和藥物等具有實用價值的產品；珍寶性是指皇家朝廷的典章文物及珍寶；美術性者包括觀念性、工藝性、藝術性、玩賞性的作品；供奉性則為禮拜供奉的神像。

人類對犀牛、大象的認識和利用經歷了若干歷史階段，據科學考古發現，舊石器時代晚期後一階段或最後冰期的晚期，在西伯利亞安加拉盆地的馬利塔遺址，原始人群使用石塊、猛獁象與披毛犀的骨骼以及馴鹿角疊成房屋，並用這些獸骨和象牙磨成裝飾品。在葉尼塞河流域的科科列沃遺址也發現了原始人群用猛獁象牙雕刻的人像和動物。大體同時或略早的時期，屬維爾姆冰期晚更新世的奧瑞納文化，克羅馬農人和格裏馬第人已在骨片和象牙上雕刻動物圖像。可以說，那時的遠古人還處於茹毛飲血的蒙昧時期，獵殺猛獁象、披毛犀後，食其肉、飲其血、衣其皮、以其骨骼支架窖穴以禦寒，或將其牙骨雕刻飾物，是他們對犀象的最早認識和利用。經過漫長的歷史進程，由舊石器時代進入新石器時代，遠古人在獵獲犀象之後，還用於事神或作法器。我國科學發掘出土最早的象牙器出自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渡頭村河姆渡文化遺址，用象牙精心製作的筭、蝶形器、匕形器等有十餘件。在該遺址中還發現了爪哇犀和蘇門犀等兩種犀科遺骸，可惜未見有關發現犀角的報導。此後在山東泰安大汶口文化遺址中也發現了梳、筒以及珠、片、管等象牙製品。說明我國象牙雕刻的歷史源遠流長。

犀角是一種十分珍貴的獸角，區別於鹿、羊、牛角。犀角器在迄今近五十年的科學發掘報導中還從未出現過一例。只是在漢墓中發現造型仿犀角的其他材質的器物，如陶質犀角冥

器、玉質犀角觥等。而傳世至今的犀角杯大多為明清兩代所製，個別的犀角器也可能略早。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可能與犀角的藥物功能以及全球氣候變化犀牛從我國消逝有關。由於犀角得之不易，相關記載也少之又少。古文獻筆記的隻言片語或可幫助我們尋覓中國犀角藝術的發展線索。下面我們以出土和傳世的犀象器物為主體，聯繫文獻，對我國犀象雕刻按時代順序作一扼要概述，供讀者參考。

一 史前象牙雕刻的源頭及其功能 (距今七〇〇〇至四〇〇〇年)

如上所述，我國史前牙雕有兩批重要遺存，即河姆渡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牙雕製品。河姆渡文化〔1〕屬中國長江流域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分佈於杭州灣南岸的甯紹平原及舟山島，其文化共分三期，共計出土器物二八八四件。從器型看，有耜、器柄、鏃、哨、鑿、匕、針、梭形器、鐮形器、靴形器、鑽頭、魚鏢、蝶（鳥）形器、筭、蓋帽形器、蛋形器、匙、管、墜飾等，大多是生產生活用具，多以素器為主，也有不少刻有走獸、飛禽以及幾何紋裝飾，堪與陶器、木器上的紋飾相媲美。河姆渡遺址共出土牙器二十五件，占全部骨角牙器的百分之〇·〇八六，因此可知在河姆渡文化中牙刻是極其珍貴的，可能只有少數特殊人物方能佔有使用。牙刻器物在裝飾形式上有其不同特點，如象牙雕匕形器上的鳥飾（圖版八、九）以及蝶（鳥）形器上的雙鳥捧火珠紋（圖版六）等紋飾，都反映了河姆渡牙雕製作者的智慧與創造力，同時也表現出他們非凡的造型能力與熟練的鐫刻技藝。在史前藝術舞臺上，河姆渡文化確乎已達到較高的水準。從河姆渡文化第二期象牙蝶形器上的火珠雙鳥徽來看，在構圖上取對稱形式，以火珠為中心，兩側配以雙鳥，頭作昂首狀，身似臥或立狀。值得注意的是，在對稱中又富有變化，所以避免了對稱帶來的呆板的缺陷而有幾分生動之感。再從陰刻刀法來看，似用高硬度的燧石、凝灰岩和凝灰質砂岩鑿為工具雕刻而成。以現存可辨的線條來看，多為弧度、粗細不等的曲線，絕少直、橫、斜線，不僅在工藝上運刀流暢而

不板滯，還給人以委婉舒展的美感，確是一幅有着很高繪畫意念的圖徽，可以說是河姆渡人以鑿為筆雕刻出來的一幅圖畫。河姆渡文化一期的象牙匕和二期的象牙蝶形器應為河姆渡牙雕藝術的優秀代表。

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石、陶、木、骨、牙等工藝製品及原始藝術品可以說明其時其地已經形成不同類型的專業化的手工業生產部門，如木、石、陶、牙、骨、角等專業化的手工生產作坊業已出現。關於這一點發掘者也認為：『河姆渡遺址時期的社會分工已經突破了先前的自然分工狀況，應該還有一批較為熟練的手工業生產者，專門從事製造石器、骨器、木器、象牙雕刻和陶器等生產活動，以適應當時的社會需要^{〔1〕}。』當然，象牙雕刻在造型、裝飾兩個方面都比骨器、角器要複雜，做象牙的人的確比做骨角的人在設計、加工上都要高過一籌，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由於象牙器出土甚少，使用者也可能不是普通的社會成員，應是管轄着原始人群的物質生活和原始宗教的統治人物。雕刻象牙的匠人在骨角牙業中應是最具聰明才智並有着豐富的藝術創造力、掌握着嫺熟工藝技術的人物，也就是一位領軍人物。象牙雕刻上的火焰珠雙鳥圖徽是非常重要的圖徽，屬於更為高層的作品。在骨板上雕刻的雙頭鷹火焰珠圖徽在理念上、工藝上與之較為接近，這也表明牙骨雕刻是相通的，其作者可能是同一作坊的不同匠人，似無可能亦無必要組成獨立的象牙雕刻手工業。所以，此時較大的可能是牙骨手工業還未徹底分離，還是屬於同一專業內的不同分工而已。

火焰珠雙頭鷹紋和火焰珠雙鳥紋（圖版六）兩個圖徽的發現是非常重要的，其文化概念及其尊重現實的藝術手法傳達着河姆渡人原始宗教信仰的資訊。其重大的歷史價值和深厚的文化內涵受到專家學者的普遍認同。

晚於河姆渡文化的大汶口，位於山東泰安、甯陽兩縣交界處^{〔2〕}，距今五千多年，出土了一批牙骨器，有牙梳二件、耳環（象牙琮）七件、象牙珠一件、象牙片二件、象牙管一件、象牙雕筒一〇件等二十三件^{〔四〕}象牙雕刻。這些象牙器大多出自墓葬，位置準確，功能清楚，在北方原始文化遺址中一次出土二十三件象牙製品也是不可多得的，其中象牙梳、象牙琮和象牙雕筒很值得探討。

如上已述，史前時期象群生活於今天華北、江南的廣袤大地上，為象牙雕刻工藝的出現與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我們還應追根溯源，去尋找更為原始的象牙雕刻製品，也就是說，我國象牙雕刻的源頭肯定在距今七千年或八千年之前，甚至有萬年之遙。

二 夏商王室牙雕之雄風威韻

（公元前二十一至前十一世紀）

夏朝是在中原建立起來的我國第一個中央王朝，第一代國王名禹，史稱大禹。相傳大禹鑄九鼎以確立中央王室的權威，並將全國分為九州；『任土作貢』^{〔五〕}，即是按其土地廣狹、肥瘠定其貢賦的等差。當時進貢犀象的有揚州和荊州兩地，據古賢考證，所貢的是象牙和犀皮，象牙可作弓弭，犀皮可作甲冑，都是用於製作武器裝備的原材料。夏九州中的揚州、荊州其地理範圍從北向南包括今江蘇、安徽、湖北三省南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省以及廣東、廣西北部 and 貴州東部等東南與中南的廣大地區。犀象在徐州、豫州不如揚州、荊州那樣多，故不能作貢品進奉夏王室。

商殷時期犀象主產地與夏時相同，甲骨文中記有殷王獵象的文字^{〔六〕}。商朝最初定都於黃河流域，後因黃河氾濫成災，『國為水所毀』^{〔七〕}。在成湯到盤庚的二十世中共遷過五次都邑，盤庚遷至殷（今安陽）。經過二百餘年的經營和建設，首都殷發展成一個繁華的大都市，不僅是當時的政治中心，而且是手工業和商業的中心^{〔八〕}。自從一九二八年開始發掘殷墟，迄今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玉器、骨角、牙等器物。骨角器有武器、工具和裝飾品，象牙雕刻作工多較精緻，但完整器物很少，惟有婦好墓出土三件象牙雕刻杯極為精緻壯觀。

婦好墓是武丁配偶之墓，婦好廟號辛，死於武丁晚期，其時代屬於殷墟文化第二期。婦好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和玉器，此外出土骨器有五六四件，發掘者分為用具、武器、裝飾品、雕刻藝術品及其他等五類^{〔九〕}，有不少的匕、梳、笄，其上都有繁簡不等的裝飾。仿

生骨雕中有動物、虎、蛙等形象，作工多簡單，點到而已，不作具體刻畫。象牙器中有杯二件、注一件以及雕花殘片和獸面紋圓筒形殘片各一件。

象牙杯兩件（圖版一一）〔一〇〕造型基本一致，均取銅觚加柄形，身與柄分別加工完成後用榫卯銜接。因受象牙材料制約，口足直徑差別不大，器身內凹，腰部曲度不足。柄作上鷹下獸狀，通身細刻回紋地、饕餮等紋飾，其紋飾佈局適應觚形身，分割為四層。口下飾雙身饕餮紋帶，身部紋飾甚長。形似獸面，頭有大角狀冠，面紋鼻下有鬚，下為蕉葉紋，兩側各飾一夔紋。紋飾圍繞杯身，成為象牙杯的主紋。此主紋形象與常見的獸面形饕餮紋有所區別，從其眉、眼、鼻、耳來看確為人面，奇異的是頭上有高聳的雙角，鼻下有銳角三角形的長蕉葉，似舌亦似鬚鬚，可能是魅頭面紋〔一一〕。此類的紋飾在婦好墓出土玉器中亦可找到〔一二〕，可謂無獨有偶，供互為參證，值得今後認真探討。象牙杯身高三〇·五釐米，是迄今發現的最大、最完整的有柄高身杯。從其紋飾鳳在上、龍在下判斷，此象牙杯很可能是專為婦好特製的禮器。另一件象牙鳳龍柄觚形杯經復原後其形制與上述象牙杯相似。尺寸亦接近。

象牙帶流注原定為杯〔一三〕。而此器有流，近似銅匜、銅觥之流形口，柄與口相對在流後，不宜作飲器，而應為斟酒用的注酒器，無鑲嵌飾物。注身高四二釐米、流長一三釐米。從此器紋飾判斷應為商王室所製象牙器，亦可稱為殷王室象牙注，時代應為武丁前期，可能與前述二件象牙杯有使用上的配套關係，但並非為婦好專門製作，很可能是武丁賞賜之物，供婦好生前舉行典禮時使用，死後殉於墓內。此三件杯注造型雄渾敦厚，裝飾華麗倩雅，確為武丁前期商王室牙雕的代表作，堪稱商代象牙雕刻的瑰寶。

從殷墟出土的商王室象牙雕刻，數量眾多，雕刻工藝水準較前代大為提高，造型裝飾的藝術造詣也很高，將一般骨角器遠遠地拋在後面，二者有着天壤之別，所以可以推想，商王室象牙工藝已從骨角工藝中徹底地分離出去，成為獨立的牙雕工藝專業，在象牙雕刻美術史上寫下了極其輝煌的篇章。

與此同時中國其他地區象牙出土最多的是四川廣漢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其中一號坑出土象牙十三株，均經火燒過，部分象牙白齒經鑒定屬亞洲象〔一四〕。二號坑出土象牙六〇

餘株^{〔二五〕}，彼此說明古代四川、雲南等地生活着大批象群。

三 西周時期王室與諸侯象牙雕刻的並存並榮 (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七七一年)

西周王室仍然承襲夏商王室製造象牙器的制度和工藝，在其基礎上有所發展。據《爾雅》記，犀象已被看作是『南方之美者』，而與其他貢品嚴加區別。犀象代表南方即揚、荊、梁三州貢品的特點，與東方之美的『珣玗琪』互為媲美。從工藝材料學角度分析，西周王室已將犀（皮）象（牙）提到了『美學』的認識高度和『良材』的禮制高度。周王在禮器製作上以犀象為原料並記於《周禮》，如《春官·宗伯第三·司尊彝》中所記『掌六尊六彝之位』，即是在使用犀象器具時，應辨明各種尊彝的用途與器皿內應裝的酒類；春天祠祭和夏天禴祭，行裸用雞彝、鳥彝，器皿下面都有承盤；朝踐用兩犧尊，供諸臣酌酢用壺^{〔二六〕}。再獻用兩象尊，這種象尊曾出土於陝西寶雞茹家莊一號墓乙室^{〔二七〕}。王室使用的車輛上裝飾有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等五種不同材料，象輅即是車尾以象牙裝飾^{〔二八〕}。王者所戴皮弁以象牙為弁，下圍緣之祗^{〔二九〕}。象牙還被用作笏，王用瑯玉笏，諸侯用象牙笏^{〔三〇〕}，此期犀角與象牙一樣，也被用於禮儀。據《周禮》載，『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三一〕}，是車尾以象牙裝飾，『節』就是信符，即奉王命出行時必備的證據。『玉節』就是用玉做的信符，『角節』是用犀角所為之節，是『守郡鄙的大夫在境內使用的』^{〔三二〕}，可知犀角已被王室用作信符，成為官用材料。

關於西周象牙雕刻是否從骨角手工業中分離而成為專業手工業部門的問題，《周禮·天官·冢宰》記：『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注：『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三三〕}。』八材之成器工藝均有特殊稱謂，『磋：磨治也』^{〔三四〕}。可知象牙雕刻工藝已是八種專業工藝之一。

象牙出土最多的是四川省成都市金沙古蜀宗教祭祀活動區遺址^{〔三五〕}，遺址位於金沙村

梅苑東北部，該遺址與黃忠村三合花園的大型建築區隔摸底河相距約八百米。二〇〇一年二月九日起，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對該地區進行考古發掘。現已發現二十六處與祭祀有關的遺存，出土了金器、銅器、玉器、石器、石器等珍貴文物五千餘件以及象牙一千餘根，還有數以千計的野豬獠牙、鹿角等，其中十一號祭祀坑還出土了象牙器十五件。此遺址發掘工作尚在繼續之中，上述成果遠遠不是其最終統計數字^{〔二六〕}。

四 東周時期象牙雕刻工藝之嬗變與發展

（公元前七七〇年至前二二一年）

周平王遷都洛陽之後，周天子已成為名義上的共主，西周王權統治已告結束，進入『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春秋時期。周王室犀象工藝雖漸趨衰微，而諸侯國適應其稱霸的要求，互為通貢或行聘禮時也缺不了犀象，這促使其犀象工藝有了長足的發展和變化。在此期象牙雕刻工藝品中確有精美者。

河南省洛陽市中州路的二四一五號墓，出土了象牙劍柄、劍鞘^{〔二七〕}。據發掘報告介紹，劍柄、劍鞘是用整塊象牙雕刻而成，裂縫處嵌有細腰，柄為橢圓柱形，柄首雕十字形稜，柄部飾有四條陽線，通身陰刻極細密的蟠螭紋。柄中心有孔以納入劍莖及部分劍葉，其紋飾與青銅器相似，而紋飾雕刻的細密精緻又是青銅器、玉器的陰紋雕刻所望塵不及的。與此紋飾類似的骨劍鞘出土於春秋晚期（第三期）墓葬（M一一五），還有倒立凹字形象牙琕和兩塊用途不明的小骨片。三塊劍鞘骨片兩側均鑽四個小孔，另一塊劍鞘端部骨片兩側各鑽三孔，尖部鑽兩孔。可知此劍鞘骨片當為木劍鞘的表面裝飾，並非骨劍鞘。鞘口雕饕餮紋，鞘身均用白色物（漆）繪渦紋，作工細緻，可能是王室或鄭國之器^{〔二八〕}。

山東省曲阜市魯國故城甲組墓春秋晚期墓葬（M一一六）出土了一件象牙梳，通高八·四釐米，二十五齒，梳身細長，應為插在髻上的裝飾用梳^{〔二九〕}。此象牙梳刀工與洛陽市中州路西工段工區二四一五號墓出土的象牙劍鞘有着極大的差別，說明不同區域象牙

雕刻在作工上存在着差別。同樣，曲阜魯國故城M二〇二：一三象牙珠項鏈亦屬甲組春秋早期〔110〕，但其製作工藝比較簡單，作工過於粗糙，很可能是倉促趕製的殉葬用的象牙冥器。

戰國時期象牙雕刻工藝在春秋時的基礎上繼續發展。隨着社會制度、文化風尚的變化，象牙雕刻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這種變化反映在出土的象牙器物上是非常鮮明的，從曲阜魯國故城乙組墓出土一批戰國牙雕可以看出它的變化。M五二出土了牙雕雲龍紋牌、杖首飾、獠牙形飾；M三出土了牙雕器帽、牙雕如意；戰國中期的M五八出土了牙雕如意、牙雕如意手、牙鐐以及牙筭、牙雕器座、牙管、有柄牙杯等器。這些象牙器作工精細，形式新穎，富有生活氣息，甚至還有幾分異國情調。

牙雕如意原定『孝順』（M三：五）〔111〕，已殘，斷為七節，尚可辨其原貌。上端作手形，手指彎曲，指端刻指甲，十分工細。手背、手掌飾卷葉紋，腕飾雲紋，柄光素，下端作龍首。牙雕如意可供搔癢用，因其搔背解癢，舒適快意，故稱『如意』〔112〕。

五 秦漢至南北朝時期牙雕工藝的氣韻與風采

（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公元五八九年）

秦始皇嬴政於公元前二二一年統一全國之後，實施『車同軌、書同文』等政策，形成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帝國，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113〕。至漢代，『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114〕。此時的南越國及番禺郡有着犀象之利，通過西南鄰國的進貢和海陸貿易，使犀角、象牙遂流入漢帝國，現今出土犀象製品及陶質仿犀象器物可證。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隨着中外僧侶往來，象牙雕刻品亦時有交流，据《南史》卷七十八《丹丹國傳》載：『大通二年（五二八年）其國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廣弘明集》卷十五《梁武帝牙象詔》云：『大同四年（五三八年）七月，詔

曰……上虞縣民李胤之據地得一牙象，方減二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又《法苑珠林》卷十二引《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獻象塔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三十五）。』說明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這近七百年內，由於佛教的盛行，佛教象牙雕刻也傳入我國，我們尚可見到藏於甘肅省文管會的印度象牙雕刻（三十六），為我國佛教牙雕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西漢時期的象牙主要出土於廣州，最重要的一批是出於南越王墓的象牙及其雕刻品。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大象牙一捆，共五支，原存放於木箱。最大的象牙長一二六釐米，整堆象牙寬五七釐米、長一二三·五釐米（三七）。據研究，『出土的五枚象牙接近非洲的雄性象牙』（三八）。出土象牙器有象牙龍首形飾、象牙飾片九件，象牙飾物四十餘件，金釵牙卮、算籌一組，殘牙雕刻器、『趙藍』象牙印、象牙棋子十八枚。其餘象牙殘器多為木漆器上的附件或飾品。

與南越王墓時期相仿的廣州南越國高級官吏和富人等墓葬（三九）出土了數千件各種質地的器物，但無任何象牙或犀角製品，僅有陶製象牙五株、犀角十九株。其中M一一五三出土了陶製象牙五件和陶製犀角四件，共九件。M一一三四C出土了陶製犀角十五件，西漢晚期的M三〇〇九也出土了二件陶製犀角，可知在南越及番禺，南越王及王室成員生前使用象牙器，死後又殉於墓內，而高級官員及富人生前可能少用象牙犀角，死後便以陶代牙角殉葬。

武帝時代的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妃竇綰墓出土了象牙器，屬於劉勝的只有虎紋牙雕一件，屬於竇綰的象牙器有四件。竇綰墓出土的象牙雕刻器均為飲食器，如象牙勺一件、象牙碗二件、象牙器柄一件，均殘破，只有象牙碗復原後尚可知其原形。口徑約九·五釐米、高四釐米、壁厚〇·一五釐米，通身光素，器口下飾一凹弦紋，器形圓潤穩健。牙勺和牙碗均殘，可見其胎薄工精、鐫刻流暢。

江西南昌西郊西漢墓出土了牙壁、環以及象牙舞女佩飾和象牙饕餮紋劍珌（四〇）。壁、環、瑗均為素器，作工簡易，唯有瑗的斷面為八角形，打磨精細，在磨、光兩個工序上頗費工夫。象牙舞女佩飾、象牙饕餮紋劍珌上的圖案均用陰線勾勒，刀工尚屬細緻，從其形

飾來看應是仿玉之作。江西漢、西晉、六朝時期墓多用白石代玉磨製璧、環以及劍首、格、琕、秘等劍具，而用象牙代玉亦屬罕見。

東漢帝國國土面積和國家實力雖遠不及西漢，出土的象牙雕刻製品仍偶可見，有代表性的是東漢曹氏家族墓出土的一批象牙雕刻工藝器物^{〔四二〕}，如元寶坑一號墓出土殘牙尺一件、牙簪二件，董園村一號墓出土牙雕人物裝飾品、牙雕龍首狀物各一件。元寶坑一號墓可能是『會稽府曹若』之墓，建於建寧三年（一七〇年）之後，董園村一號墓為『曹侯』墓，建於延熹七年（一六四年）之後，二者均為曹氏家族中的顯赫人物，建墓於桓帝末年至靈帝初年。所出象牙雕刻均其生前使用之器，可以代表東漢朝廷高級官吏所用象牙雕刻之水準和特點。

三國之後，除西晉司馬氏五十一年短暫的統一，中國歷史便進入了紛爭時期，長達二百七十三年之久。南北對峙，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統治者卻大量地使用犀象、玳瑁、翡翠、珠璣等珍貴材料製造禮儀典章器物和生活用品。如後趙石季龍做象牙扇^{〔四三〕}，這是傳流下來的一條記載而已，而此期的傳世或出土象牙雕刻亦寥寥無幾，如三國時期牙雕人物、西晉象牙唾壺、西晉永嘉元年（三〇七年）牙尺（圖版一二）等，亦屬不可多得之牙器。

六 隋唐至宋元時期牙雕工藝拾零 （公元五八一年至一二六八年）

隋代結束了南北朝對峙局面，建立了秦漢之後又一個統一王朝。出自太原的李氏政治軍事集團推翻隋朝，於公元六一八年建立了唐王朝，經過貞觀之治，都城長安成為當時世界第一國際大都市，中西交流頻繁，百國來朝，使節接踵而至，象犀及其牙角不斷進入唐朝中央政府供皇家享用，但出土的隋唐象牙製品甚少。日本正倉院收藏唐代紅牙撥鏤尺、綠牙撥鏤尺各二件，紅牙撥鏤棋子、紺牙撥鏤棋子各五枚以及斑犀如意等犀象雕刻工藝品^{〔四四〕}。

『撥鏤』是唐代牙雕的新工藝，從上述撥鏤象牙雕刻實物來看，其工序是：一、成型，磨光；二、染色，顏色有紅、綠、紺等色；三、畫樣，將圖依樣畫在象牙上，再以尖銳的工具按圖案設計草圖刻畫。這種工藝盛行於唐並傳播至國外。此期出土或傳世的象牙雕刻器物有隋唐象牙笏板、象牙帶鉤、象牙簪以及象牙撥鏤鳥獸花卉紋尺（圖版一三）等，這不足以反映繁花似錦的隋唐牙犀工藝的盛況。

五代、宋、遼、金、元朝廷用犀象完全依靠南方、東南方諸國進貢或靠貿易進口的途徑。珍貴的犀象材料主要用於車輿（象輅）、笏板、帶飾和佩飾等朝廷典章器物。據高濂《燕閑清賞箋》記：『宋人王劉九……刻畫諸天羅漢、經面牙板並翻經牙籤，種種工細，工奪天巧（四四）。』庶民將犀象用作實用器物或藥材。在國外還有『宣和』、『宣和年製』款犀杯，從出版物（四五）載登圖片來看尚須認真研究、慎重判斷。此期出土或傳世的象犀雕刻也很少，如金代象牙雕刻四羽人二龍戲珠紋蓋盒和牙雕魚佩飾和元代象牙飾件（圖版一四）等，僅僅反映了犀象工藝的一角，距離其全貌相距甚遠。

七 明代犀象雕刻工藝的士庶化和鑒賞化

（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

元代統一中國之後實施了極端民族歧視與壓迫，民族矛盾不斷激化，國祚不長，僅僅統治了九十七年便被農民起義軍所推翻，起義領袖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定都南京。明王朝積極地發展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城市工商業得到繁榮。為了擴大明帝國的政治影響、開拓國外市場、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明成祖朱棣指派『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擴大了與南洋及印度洋沿岸諸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藝術的交流和聯繫。此時，歐洲新興勢力的代表工商資本家，為了尋求廣泛的市場和廉價的勞力，加速原始積累的過程，派遣科學家和武裝船隊越過大西洋到美洲，繞過好望角，至印度洋、太平洋四處遊弋，在武力保護下進行不平等的掠奪性交換。明代晚期，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強國商船已開到東南沿海浙、閩、

粵等沿海大港口城市。明中晚期，隨着棉花種植業的擴大與棉紡織業的發展，經濟繁榮，東南地區人民富庶，生活品質改善，庶民意識逐漸抬頭，地方富貴人家和有教養的人士出資建設豪華的花廳、住宅和院落，也修建了一些園林，在豪宅和園林內用輸入的硬木打造門扉、窗戶和內裝修的隔扇、插屏、桌椅等傢俱，開闢了以進口硬木材料進行裝修和製造木器的新時期。官僚富賈、文人雅士無不爭先恐後收販骨董，古玩不足便收買本朝的名人書畫和高級工藝品，永樂剔紅、宣德彝爐、景泰琺瑯、成化五彩、名工雕刻以及倭漆、倭銅等都成了搶購收藏的對象，骨董、時玩兼收並蓄已成為熾盛一時的社會風尚。

此時犀角、象牙雕刻也備受朝廷重視，在諸多方面加以應用。朝廷設訓象所，由象

奴飼養訓象，『以供朝會陳列、駕輦、馱寶之事』^{〔四六〕}。天子五輅設象輅。各級官吏用

笏，郡王長子和一品至五品官吏均執牙笏^{〔四七〕}。刻期冠服，用諸色闊匾絲條，大象牙雕

環，洪武六年，惟用雕刻象牙條環^{〔四八〕}。符牌計用金銀、象牙、銅等材料製造。犀角、

象牙在內廷的使用上似不如玉、金銀那樣重要，當然比銅要高。譬如武官八品用犀牛補

子，犀角多用作帶飾，使用犀帶的人地位品級較高，皇妃、皇嬪及內命婦帶用金、玉、犀

^{〔四九〕}。用犀帶的有鎮國將軍、二品文武官、二品命婦、內使以及琉球中山王等^{〔五〇〕}。犀

象在明朝朝廷各有用場，可謂為皇家典章用貴重材料。犀象在收藏家心目中確是珍寶中二種。明初鑒賞家曹昭《格古要論》記有犀角的產地、品種、特點以及鑒定要點等見解。關

於象牙條目曹昭僅記鬼功球一則，到了明末，杭州戲曲家、鑒賞家高濂從審美角度指出：

『我明宣德年間，夏白眼所刻諸物……可稱一代奇絕。傳之久遠，人皆寶藏，堪為住世一

物，去鑲嵌何如？嗣後有鮑天成、朱小松、王百戶、泉潯崖、袁友竹、朱龍川、方古林

輩，皆能雕琢犀象、香料、紫檀、圖匣、香盒、扇墜、簪鈕之類，種種奇巧，迴邁前人。

若方（古林）之取材工巧，別有精思。如方（古林）所製瘦瓢、竹拂、如意、幾杖，其就

物製作，妙用入神，亦稱我朝妙技^{〔五一〕}。』高濂告訴我們，明代宣德朝及至中晚期至少

已有七位雕刻名家突現於世，雕鏤的材料包括烏欖核、犀、象、香料、紫檀等，其中多為來自海外珍貴原材。此時名家雕琢珍貴原材的雕刻製品已為富貴人家和博雅君子所愛好並

加以收藏。

明代象牙來自廣西、雲南以及交趾、安南和西亞、東南亞諸國進貢和貿易，因進貢和輸入的象牙價高量少，主要用在朝廷高官以及富有人士之間。朝廷用象首先是皇帝所乘五輅中的象輅，百官印信以銀銅印、條記，亦偶用特賜牙雕關防者，以及高官所用的笏板，據《明史》載，郡王長子、一品至五品的官吏均用牙笏。符牌中設有牙牌，永樂六年（一四〇八年）駕幸北京扈從官俱帶牙牌。凡郊廟祭祀，供事官及執事者入壇俱領牙牌。分為圓花牌、長方牌和長素牌三種。凡駕詣陵寢，扈從官俱於尚寶司領小牙牌，分為雲花圓牌、鳥形長牌。凡文武朝參官、錦衣衛當駕官亦領牙牌，以防奸偽，其制以象牙為主，刻官職於上，不佩則門者卻之，私相借者論如律。牙牌字型大小，公、候、伯從『勳』字，駙馬都尉以『親』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場官以『樂』字，入內官以『官』字。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禮科邢寰會，牙牌惟常朝職官得懸，與關防之具不同，用於『以示等威之辨』。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尚寶司所貯舊牌數百，上有『入內府』字樣^{（五二）}。偶亦用作刻期冠服、諸色闊匾絲條上的大象牙雕花環或雕刻象牙條環^{（五三）}。朝廷用牙似以笏牌為主。現存故宮博物院的蟠龍筆山、荔枝螭紋方盒等皇家牙雕可能出自『御用監』，象牙雕麒麟鈕關防（圖版二九）、象牙東司房腰牌、牧馬千戶所腰牌均為朝廷或地方官員所用之關防和腰牌。

明代牙雕遺存多為傳世骨董，現收藏地點分散，鑒定標準不一，所以在年代、品格的鑒定上難求一致。象牙雕麒麟鈕關防為明朝廷所製牙雕，麒麟作昂首欲起狀，右前肢已立，左前肢屈曲，口微張，露齒，眼圓睜，眼球凸出，髮立，前肢有火焰紋，鱗作龍鱗狀，坐於長方臺上，形象剛健，姿態生動，刀工細緻，拋光認真，屬朝廷牙作中的佳作，然考《明史》無麒麟鈕，銅關防直紐廣寸九分五釐、長二寸九分、厚三分，九疊篆文。尺寸與此象牙麒麟鈕近似，『正德時，張永征安化王，用金鑄，嘉靖中顧鼎臣居守，用牙鏤關防，皆特賜^{（五四）}』，故此象牙麒麟鈕即應為特賜牙鏤關防，時代亦相彷彿，可稱為『牙鏤關防』。